

唐宋變革時期中原王朝與內陸亞洲 主要族群政權的互動

張廣達 院士*

蔡長廷、許正弘 增訂成文**

摘要

本文係據第一屆「東吳大學陶晉生院士歷史講座」第一場演講增訂而成。六世紀末到十世紀初的隋（581-619）唐（618-907）兩朝歷史，在時人記載和後人著述中，大都被強調為幅員廣袤而統一的盛世。誠然，安史之亂（755-763）前的唐朝，委實可稱興盛。當時身為農耕地區編戶齊民的皇帝，同時被草原游牧族群尊為天可汗。其後，八世紀中葉直到晚唐五代時期，政局動盪、多族群複合體的社會分化，特別是藩鎮分據地區，在胡風浸潤下而衍生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多元交疊。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跨文化的衝突與互動既促進彼此的涵化與融合，也構成朝代更迭和異族建立邦國的誘因或機緣。因此，探究中原王朝與游牧族群在唐宋變革時期的演變與傳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關鍵詞：唐宋變革、隋唐五代、安史之亂、多元族群互動

* 東吳大學陶晉生院士歷史講座教授

** 蔡長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共同研究者；許正弘，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引言：唐宋變革時期族群互動的歷史脈絡

本講旨在對北周（557-581）以來的中原王朝與內陸亞洲東部主要族群政權的互動做一初步探討。由於時間有限，不得不將探討唐宋時期前後的族群對立、衝突、融合、相互接納的過程，限制在北周、隋唐、五代至宋初，亦即從六世紀中葉開始，歷經大唐（618-907）與五代十國時期（907-960），再至宋代趙匡胤（927-976；960-976 在位）開國，迄於十一世紀之初宋與契丹／遼達成澶淵之盟（1005）。

西元 552 年，突厥取代柔然，在漠北建立汗國，隨後三十餘年間分裂成東、西突厥。突厥建國的時間點，正值農耕地區結束五胡十六國的北魏分成東魏、西魏兩政權，並進一步演變成宇文周與高齊的時期。換句話說，此時期不論遊牧地區與農耕地區，皆受到北魏分裂的影響，更是孕育了南北朝晚期的勢力分野，直至楊隋和李唐兩朝的建立。五胡十六國如何孕育隋、唐？怎麼理解這段過程？

唐代早期統治者一方面在農業地區作為編戶齊民的皇帝，另一方面在草原被若干族群尊為天可汗（Tengri Qaghan），國勢盛極一時。但大唐到了中、晚期，因為多族群構成的社會分化，造成政局動盪不穩，國力走向衰亡。我們或許可以說唐朝前期受到五胡十六國的因素孕育了統一，在盛世後又重回多族群的衝突互動，產生新的動盪。對隋、唐而言，在胡風浸潤下，多族群互動衍生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多元交疊。基於不同利益與民族型態劃分，不論是遊牧地區的首邦、汗國，或者是農業地區中一些分立的政權、皇朝，都是在多族群環境下相繼創立，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都有所體現。大唐帝國的遺產，用韓國歷史學家朴漢濟的話說，就是「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¹

在這種空間環境下，歷史研究者可借鑒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到的歷史三時段概念，區分不同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中時段，或某個短時期來處理具

¹ [韓] 朴漢濟著，郭利安譯，《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新北：八旗文化，2020）。

體的歷史表現。²歷史書寫的是長時段空間下的多族群衝突，短時段中的表現往往演化成具體歷史事件。所以治史者在自身專業學習中，除了注意研究和掌握原始史料之同時，也不能忽略近代科學所帶來的各學科成績，例如人類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好比美國人類學家埃爾曼·塞維斯（Elman R. Service, 1915-1996）考察人類社會提出的四階段說：遊團（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國家（states）。³而遊牧民族和農耕地區民族居民的最大不同，就是農耕地區生產資料是基於農業的、是農耕所用的，而遊牧地區的牲畜既是生活資料，同時也是生產資料。這些學問對史學有參考價值，或可幫助我們處理長時段的問題究竟該怎麼看待，中時段裡又該總結哪些課題。但也要特別注意岑仲勉（1885-1961）先生的提醒，不可「昧於掌故，徒抱現代之觀點，尚論古代之民風，弊遂至於格格不相入」。⁴

中時段的主要內容，其實就在於多族群不同生產方式的互動，通過經濟上的利益衝突、合作、掠奪，重新進行分配。政治上出現的那些英明人物，如唐代的李世民（598-649；630-649在位）、後唐李嗣源（867-933；926-933在位）等人能夠處理複雜的族群問題，找到出路。他們的族群互動行為影響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鑑》，最後加以記錄下來，也見於後繼王朝編撰正史所記載的某些事件。

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於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變革，體現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轉變的契機。內藤氏將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唐宋變革說作為假說或學說，經過時代檢驗，具體內容有所改動，一些史實詮釋得到修正。但是，作為一種範式，持續為人們研究和闡釋中國歷史提供豐富的啟示，推動進一步探討唐宋變革期、宋史及宋元以後的歷史變

²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唐家龍、曾培耿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³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

⁴ 岑仲勉，《唐人行第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437。

革。⁵現在提到族群互動的課題，即便已有相當豐碩可觀的學術遺產，卻在過往唐宋變革說的討論中較少納入考量。過去，我曾發表〈從隋唐到宋元時期的胡漢互動兼及名分問題〉，多少有所闡發。⁶經過幾年的觀察，我認為仍有必要提請學界留意，相信有助於吾人更加認識唐宋時期歷史的全貌。

二、重要研究成果回顧

1. 陳寅恪 (1890-1969)

在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將研究的時間貫串長時段與中時段，這是相當特別的著眼點，也是他與今日學者不同的地方。在其傳世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先生的討論特別著重在隋、唐。⁷《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也引申了後期發生的變化，突顯前期「淵源」的重要性。陳先生針對唐代各族盛衰之連環性提出見解，認為唐朝的衰敗非出自偶然，而是有一連鎖性的因果關係。他進而推論種族與文化的重要，是為理解唐代的關鍵所在。

引發唐朝存續危機的安史之亂 (755-763)，最後以失敗收場，唐皇室得以維持存續，但陳寅恪先生卻認為亂後與中央持續抗衡的勢力，儼然已將一朝分為二國。至後期藩鎮割據，各藩鎮依照不同形式生存，或與中央強硬競爭，或是表面歸化順從實則獨立，更將名義上的統一王朝碎片化了。誠如陳先生認為唐代後期實際上被分為兩國，我們可用「破碎化」加以形容之。

這段歷史被後世的司馬光、歐陽脩 (1007-1072) 等史家記錄下來，成為該

⁵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57-133。

⁶ 張廣達，〈從隋唐到宋元時期的胡漢互動兼及名分問題〉，收入許倬雲、張廣達主編，《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5），頁139-196。這種互動複雜性不只見於中國，更是歐亞草原地帶的重要現象，值得注意。參見Jan Bemann, Michael 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⁷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同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

時代的大歷史，這是史家對被記錄者和時代的認知與瞭解。今天探討歷史，除了閱覽該時代的資料文獻，也要運用新出土史料做比較。例如討論安史之亂中的柘羯（Čakar）、曳落河、義子、親兵等，可以試圖追尋它的來源背景，查找內陸亞洲、中亞民族民情風俗的關聯。如此處理，可將司馬光、歐陽脩等人所記錄的歷史體現於各個時間、空間背景裡，另一方面也借助個別人物的主觀、文化層次的表達，帶領我們更加認識歷史的樣貌。

2. 楊聯陞（1914-1990）

人們還可以談論一個朝代是完整的，還是破碎的，為什麼完整？又為什麼破碎？對此，可參考楊聯陞先生在《國史探微》中的〈官修史學的結構——唐朝至明朝間正史撰修的原則與方法〉一文所提到的「如何」（How）與「為什麼」（Why）這兩個關鍵取徑。⁸〈官修史學的結構〉藉由中國古代王朝所編修的正史，包括《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九部官方史書，說明官方委託當時一批史學專家，由他們整理實錄，編寫歷史。史家在實錄選取什麼，為什麼這麼選，有何道理？這是楊先生提示我們如何對歷史進行仔細思考。確實，今天撰寫一篇論文，選擇什麼題目，要將其放在哪一時空背景？放在長時段或中時段？又或者置於長、中時段所交織、塑造的短時段加以處理，都值得深思熟慮。

楊先生在《國史探微》中還有〈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國史諸朝興衰芻論〉等文，⁹同樣也都指出了討論、處理歷史的方法，這些也涉及今天講題所著重的族群互動，提示如何看待歷史中的族群互動。我們還要參照陶晉生先生《宋遼金史論叢》收錄的〈同化的再思考〉和〈略論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二文。¹⁰前者從同化的概念出發，在多側面（aspects）

⁸ 楊聯陞，〈官修史學的結構——唐朝至明朝間正史撰修的原則與方法〉，收入氏著，《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351-375，特別是頁351-352。

⁹ 楊聯陞，〈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收入氏著，《國史探微》，頁1-19；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氏著，《國史探微》，頁21-42，特別是頁27-29、41-42。

¹⁰ 二文收入陶晉生著，《宋遼金史論叢》（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515-532、533-540。

和互動的影響下，進而引發重新思索歷史中同化的意義；後者則從邊疆民族出發，以外族為整體討論中心，探討異族歷史的定位、作用，乃至重要性。

3. 傅禮初 (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

我以前從大陸到海外與幾位西方學者、同事談論研究話題，許理和 (Erik Zürcher, 1928-2008) 與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2018) 詢問：「你接下來打算從事哪方面的課題？」我說希望在向達 (1900-1966) 等先生的成果之上，繼續進行敦煌文獻方面的研究。許理和沉默幾秒鐘，回答說：「我覺得你應該花些時間看看西方當今的漢學家怎麼研究中國的歷史。」我感到他們的建議很中肯，切中要害。於是我借助於他們的介紹，先後前往法國和英國，從那時起也建立與法國學者的聯繫。

二戰之後，伯希和 (Paul E. Pelliot, 1878-1945) 於 1945 年底因癌症去世。二戰期間流亡法國的白樂日 (Etienne Balazs, 1905-1963) 於 1947 年返回巴黎，1949 年被任命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研究員，持續他當年在德國與福蘭閣 (Otto Franke, 1863-1946) 合作的隋、唐兩代食貨志翻譯和研究。這時，參加二戰的一批歐洲青年學子陸續退伍，他們退伍後繼續回到學校唸書，有些也回到歷史學科。白樂日趁勢帶領當時冒頭的一批有才華的歐洲學子，舉辦歐洲的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歐洲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一共舉行三、四次活動，白樂日當時從事制度史研究，也在歐洲青年漢學家會議上正式提出種種建議，特別是著名的「宋代研究計畫」(Le Projet Song)。¹¹當時中國派出的代表沒有直接了當的反對，卻獲得日本京都大學同事響應，更引起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的注意。我在同事的介紹下接觸到幾位這樣的學者，非常感謝這幾位先生提示在當代做歷史研究的方針，提醒要參考有成就學者的研究成果。

本次講座講述內陸亞洲與唐代的族群互動，因而就涉及如何選擇切合課題的內亞史領域。在上個世紀的內亞史領域裡，哈佛大學有一位造詣備受讚

¹¹ 關於白樂日的生平及研究介紹，見〔法〕戴密微，〈法國的經濟史漢學家白樂日〉，收入戴仁編，耿昇譯，《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 299-306。

譽的學者——傅禮初教授。他認為西元1200年，約略為成吉思汗（Činggis Qan, 1162-1227；1206-1227在位）開始活躍於歷史舞臺的時段，發生了一些連鎖事件，可以稱之為「多重歷史相互連鎖」（interlocking of histories）的時代。¹²此一說法，今日也常常被研究中亞史的學者引用。無獨有偶，傅禮初所考察的「多重歷史相互連鎖」現象，在上揭陳寅恪先生有關唐史的著作中也有「外族盛衰之連環性」的提法，可與之相呼應。

4. 劉盼遂（1895-1966）

經過數十年的討論，史學界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在寰宇性、多元文化容納性方面，唐代扮演著承上啟下的角色。它的容納性體現為包容多族群文化，例如在宗教上融合印度的佛教、中國的道教，以及遊牧民族信奉的祆教、摩尼教與景教，其他還有生活方面的影響等。

唐代的容納性與普世性，結合許多的民族元素，特別是代北鮮卑等族後裔還保存下來的某些慣習。楊隋、李唐兩朝誠然是承上啟下的統治者，他們結束五胡十六國混亂的局面，再度迎向統一的中國，比起前朝統治範圍更為擴大。我們應該探究：隋、唐以來的皇室來歷為何？為何五胡十六國之後是單獨由楊氏、李氏達成統一任務？

隋、唐的皇家來歷，大都與代北鮮卑族有所關聯。其中，某些關鍵族姓也有其他族群，不見得都是鮮卑族，源出匈奴的宇文氏即是一例。¹³儘管如此，大多族姓仍然出自「五胡」中的代北鮮卑族，尤其是其中的拓拔部，證明當時確實是有兼容並蓄的格局。但不管是何族，根據現在看到定型文本的敘述，這些人都成為漢族。在現在漢文傳統史學中，漢、唐並稱已是常態，但實際上，漢、唐兩者存有很大不同。在不同程度上，隋、唐的文本敘事中多自託於漢族，成為漢朝以來的正統，以至於傳統史學多以漢、唐並稱。有

¹² [美] 傅禮初著，董建中譯，〈整合史：早期現代（1500-1800年間）的平行發展與相互聯繫〉，收入伊沛霞、姚平、單國鉞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321-354。

¹³ 關於北周的宇文氏，據周一良師考證，當為匈奴後裔，有本有據，不能一概都納入鮮卑族的族群之內。見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收入氏著，《周一良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20-239。

無區別，實則不辯自明。這一點，宋代以來的史學家並非沒有覺察。

宋朝著史者對楊隋、李唐皇室來歷早已有所懷疑。儘管隋朝開國者楊堅（541-604；581-604 在位）、唐朝開國者李淵（566-635；618-626 在位）二人在建立王朝之際就宣稱自身的正統，仍然無法擺脫後世史家的重新檢視。為司馬光《資治通鑑》做標音和注釋的胡三省（1230-1302），對此早有敏銳觀察，他說：「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¹⁴這是胡三省見解的獨到之處。那麼何謂代北呢？這是解讀這段文獻需要首先解釋的。代北是五胡十六國時期鮮卑人拓跋猗盧（?-316）所建立的政權，歷史上稱之代國，是為拓跋北魏前身。此處有一點確實值得今人省思，人們一提起「五胡十六國」，都會說其中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成漢、大夏，卻沒有列入代國。如果加以擴大討論，或許可以說「五胡十六國」裡面所缺少的並不僅有代國。誠然，「五胡十六國」一詞為歷史學家所記錄下來並予以定義的，在文獻中亦可探尋得到。然而，就我們對歷史的瞭解，當時歷史上僅有五胡嗎？僅有十六國嗎？缺少的代國，也許可以進一步推論，這個名稱有助於理解隋朝起源，也有助於注意搜索隋、唐史裡族群融合所欠缺的重要來源資料。

關於隋、唐與代北的關係，陳寅恪先生的高足劉盼遂（1896-1966）先生，在所著〈李唐為蕃姓攷〉三文中前後共列舉十七條例證，論證李唐並非李耳後裔。劉先生認為：「李唐蕃姓之說，唐人蓋深知之。然率自為尊者諱莫如深。如終唐之世率無人訟言攻之。至宋代始有敢論其事者，如光、寧間松陽項安世即其人也。」¹⁵位居皇帝的李氏非漢族之身，可能在當時已是廣為人知，只是世人不敢犯上招罪於己罷了。劉盼遂先生引用《永樂大典》采輯本所錄項安世（1129-1208）《項氏家說·說事篇》裡〈王氏李氏〉條：

柳芳《唐曆》言「王珪曾祖神念在魏為烏桓氏，仕梁為將。祖梁太尉王僧辯遂為王氏。至珪始為儒。」按此則《文中子》謂其上

¹⁴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108，〈晉紀三十〉，頁3429。

¹⁵ 劉盼遂，〈李唐為蕃姓攷（三）〉，收入聶石樵輯校，《劉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658。

世世皆有著述者妄也。¹⁶

唐朝宰相王珪（571-639）先祖出身於烏桓氏，隨著境遇逐漸改變身分，由武將轉為文儒，前後落差頗為巨大。劉盼遂先生據《唐六典》的記載也指出王珪本姓與複姓的問題，與前述史料有所吻合，加強了論點的說服力。此外，盼遂先生更引用唐人柳芳《唐曆·高祖卷》之卷首：

唐之祖為後魏金門鎮將，鎮武州（引者按：應為「川」），遂為武州（引者按：應為「川」）人。至虎為西魏柱國，賜姓太野氏。隋文帝作相時，始復本姓，為隴西李氏。¹⁷

此文明確指出唐朝開國者先祖出身鎮將，從姓氏的幾經輾轉可以看出其先祖族群淵源的脈絡，過往認為李唐原先即為關隴李氏出身者，則有些顛倒是非。劉盼遂先生〈李唐為蕃姓攷〉對李唐族源提出蕃姓的新觀點，儘管在今天看來，他所列舉的證據有幾條稍微牽強，但仍然提出新解，值得學史者學習思考。

三、六鎮的設置與「周隋唐皆出自武川」說

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為了抵禦柔然、內制高車與山胡而建立的邊防六鎮鎮民，終於因為累積種種不滿而大舉暴亂，導致沃野鎮破六韓拔陵（466-525）、柔玄鎮杜洛周（?-528）、懷朔鎮鮮于修禮（?-526）及葛榮（?-528）、北秀容酋豪爾朱榮（493-530）相繼反叛。六鎮設立時值北魏太武帝（408-452；423-452 在位），在北疆邊患的軍事考量下，設立六鎮以防禦柔然南侵首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然而，至孝文帝（467-499；471-499 在位）時，因應文化、經濟等族群要素，將都城由平城遷至洛陽，對待都城的鮮卑族人與六鎮的方式漸有出入，文化差異也日趨擴大，最終爆發六鎮之亂。其後，爾朱榮得勢，揭開北魏分為東、西和北齊、北周相繼登場的序幕。約略在同一時段，在西元 552 年的漠北，則是突厥趁機崛起，取代柔然，建立突厥汗

¹⁶ 劉盼遂，〈李唐為蕃姓攷（三）〉，頁658-659。

¹⁷ 劉盼遂，〈李唐為蕃姓攷（三）〉，頁659。

國，成為當時北方蒙古高原上的遊牧民族霸主。正是在這一時期的族群對立過程中，出現一批軍事豪傑，他們是建立宇文周一朝的奠基者，也是六世紀下半葉和七世紀初楊隋、李唐兩朝開國君主的上一代長輩，更是陳寅恪先生所說關隴集團之前身。

從實際史籍文獻記載來看，清代趙翼（1727-1814）《廿二史劄記》的〈周隋唐皆出自武川〉條即已明確指出：

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壽，家於武川，元壽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為隋文帝。¹⁸

北魏之後的北周、隋與唐的先祖皆出自武川鎮，三朝承續歷史脈絡同源的出身，也許並非歷史巧合所促成，或可作為推論五胡十六國是隋、唐皇室族群來源的探討線索之一。同篇史料進一步提到：

李淵（三）〔四〕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錫〕，天（賜）〔錫〕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為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¹⁹

唐代開國者李淵的家世出於武川，與前述史料的宇文泰（507-556）、楊堅同源。三代帝王同出武川一地的淵源，也加深認識隋、唐兩代創建者與胡人族群的關係。清朝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的確切記載，顯示後人已對此問題有所考慮，也從過往紀錄上得到證明。

除距唐朝八百餘年後的清人記述外，唐代本身修撰前朝史，也提供了相關訊息。唐代令狐德棻（583-666）在《周書》的〈文帝紀上〉，說：

九世至侯豆歸，為慕容暉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帝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

¹⁸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5，〈周隋唐皆出自武川〉，頁319。

¹⁹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15，〈周隋唐皆出自武川〉，頁319。

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²⁰

令狐德棻所記錄的此條史料交代代都的軍事豪傑來歷：北魏之際即有大量豪傑據守代都，此地作為抵禦北方的前線區域有著不可忽略的戰略地位，亦是實力者輩出的場域。北周、隋、唐三朝之祖，皆出自六鎮之一的武川，實乃不能因為它位處區區彈丸之地，而忽視它在歷史的重要性。

四、唐朝政權的遊牧元素及其國勢的衰落

討論至此，可知唐代先世某些人物並非如過往記載之所述，撰述者往往任由君主的意圖所驅使而著筆，以利他們出身地位的升格化。事實上，唐皇室發源自前述的武川，而武川鎮諸將早先也是經歷搬遷而來，是為遊牧民族的緣故。遊牧民族的特徵為何是遊居遷徙，反覆更換牧地？根據哈扎諾夫（Anatoly M. Khazanov, 1937-）的說法，他認為遊牧民族是有目的的遷徙，諸如基於生活、天災等原因，²¹漢代南匈奴南遷就是因為北方發生災害。災害關係到遊牧民族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牛羊如果遭逢災害，可能因為牧草缺少、疾病等因素而大量死亡，促使遊牧民族進行長距離的、有目的的遷徙。此外是因時節、氣候狀況的日常遷徙，遊牧民族會根據季節時間定期遷移。武川既位於北方防禦的關鍵位置，又是距離遊牧地區相近者，因而適合作為遊牧民族的輾轉搬遷地。

基於民族文化與生產模式的差異，北周、隋朝和唐朝前期的掌權者，留意於借鑒前朝的外族治理漢地經驗，而開始創立新的典章制度。特別是北周，北周比照儒家經典《周官》，將新頒律令編為《北周六典》，以因應民族的差異性。到了隋朝和初唐時期，當政者更加注意此點。這有如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提出的，一方面保持自身個性（identity），另一方面則維護慣習（habitus），同時也是為了適應新的區域文化、經濟條

²⁰ 〔唐〕令狐德棻等撰，唐長孺點校，《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1，〈文帝紀上〉，頁1。

²¹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件，進而達成所謂文化上的交流。²²唐朝將律、令、格、式更加系統化，體現在《大唐六典》的編輯上，然而《大唐六典》源自於《北周六典》的事實，已逐漸被人們所遺忘。民族交流日益頻繁下，亦帶來文化影響和生活改變。實施府兵制、均田制等措施的目的，在於加強對外的作戰實力，這是因應兵制不同和戰力需求而設置，但至安史之亂爆發前夕，府兵制已無法發揮完全實力，朝廷只能另外招募兵將解決，也種下亡國遠因。陳寅恪先生將上述這些新興措施稱之為關中本位政策，也就是以關中為本位的執行理念，充分表現出民族交流當中的互動、衝突與調和關係。

唐太宗曾先後編修整理不少資料。例如為了加強自身對漢人貴族門閥社會的統治，一再編輯姓氏譜系，實有民族過渡上的政治考量因素。山東、河北、河朔等地區，為漢族大家世代居住之地，面對朝代更替、戰亂興亡，他們仍然可以在社會中保有一定的社經地位。唐太宗透過系譜的重新整理與調整，一方面削弱貴族門閥的跋扈地位，另一方面也順勢提升李氏在政治、社會的正統地位。除家族系譜外，唐太宗即位之後也十分重視史書修纂，曾前後下令編纂《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和《隋書》與《晉書》，後來更讓李延壽（初唐時人，生卒年不詳）編修《南史》、《北史》兩部綜合史。李世民對史書的需求可能出自文化上的需要，特別是《南史》，藉以更加瞭解漢人文化，也彌補自己不足之處。²³

唐朝作為從武川遷徙到中原文化地帶游牧族群後代所建立的政權，在許多地方皆需要考量，包含需要建立政權結構，對於政治結構又需要運用何種文字和法令加以穩固下來都是挑戰，最後建立出一套律令制度。隨著時間推移或運作過程的變通，部分律令已顯得不合時宜，遂增加格、式兩者，以彌補律令的不足和缺漏，這是唐代律令國家之稱的由來。因此，受到唐文化影響甚深的日本學人，在總結唐朝特點時，首要著重強調的是律令，其後則是重視儒教思想、漢傳佛教以及漢字，這四者反映當時唐朝文化成果的繁榮昌盛。²⁴

²² Pierre Bourdieu,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²³ 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²⁴ [日]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總說—〉，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4

唐代中期國勢遠遠不如以往強盛，一些戰爭圍繞著唐朝的周邊，內部藩鎮戰事也連綿不斷。當唐廷全力應對吐蕃和東、西突厥反覆協同進犯安西四鎮之時，東北的奚和契丹兩族趁機崛起。697年（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唐朝名將王孝傑（?-697）率軍出征契丹而陣亡。747年至750年，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1258）取代白衣大食（倭馬亞王朝，661-750）。751年（唐玄宗天寶十載，安史之亂前三年），唐與黑衣大食發生怛羅斯之戰，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756）統率多族群軍與大食軍交戰，也以敗績收場。其後不久，出身粟特（Sogdian）、卻已突厥化的安祿山（703-757）、史思明（703-761）所統帥多種親軍，包括柘羯、曳落河、義子等親兵、親信，於755年至763年發動叛亂。唐廷為平叛而從西域撤軍，國力至此一蹶不振，也使得唐代的漢字文化圈隨之大為蜷縮。亂平之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時期，亦即中、晚唐時期，已是無力回天，陳寅恪先生形容為儼然兩個國家的狀態。事實上，隨著沙陀突厥等部族於中、晚唐時期逐步東遷代北，往後的五代十國再次進入群雄割據的亂世，是可預見的。

當我們先把時間回溯至東魏、西魏與北齊、北周時期，空間則聚焦於蒙古草原，可發現在柔然後崛起的突厥第一汗國（又稱東突厥汗國），其後經歷尊奉唐太宗為天可汗的時期，至唐高宗時期重建突厥第二汗國。此時要注意的是武則天經營安西四鎮，防止吐蕃跟突厥聯合，反而使得東北地區的契丹、奚逐漸壯大。697年，唐代名將王孝傑在討伐契丹戰役中陣亡，在西域百戰百勝的一個將軍，對付不了契丹，就連後來的安祿山都難以應對。總之，697年是唐朝由盛世狀態開始逆轉的第一個標誌。

第二個標誌是747年至750年，黑衣大食取代白衣大食後，在天寶十年利用一個分支部隊，就和唐朝發生怛羅斯之役。高仙芝本想藉此消滅大食人勢力，但由於他底下統治的葛邏祿（Qarluq）等突厥系族群叛變而戰敗。第三個標誌則是安史之亂。粟特昭武九姓與突厥族群，彼此在唐朝編戶齊民區域內呈現共生發展，突厥人借助粟特昭武九姓的文化，以及經營商業能力的資助。安祿山與史思明的出身都體現這樣的背景，且已有多種族群開始和粟特人結合，依靠以此發展出來的曳落河、親兵、義子（假子），靠著這些自身

培養出來的親兵起兵對抗唐朝。²⁵

五、餘論：晚唐五代時期的族群互動——以沙陀為例

745年，回鶻滅掉突厥第二汗國。在前述安史之亂中，回鶻汗國大力協助唐帝國。森安孝夫認為是粟特人勸服回鶻讓唐朝存在，對於回鶻更為有利。唐朝開邊與回鶻進行絹馬交易，回鶻人因此獲得巨大利益。唐德宗（779-805在位）再次借回鶻人對抗吐蕃，回鶻與吐蕃在今天吐魯番進行非常激烈的爭奪。²⁶這些都要考慮到回鶻與粟特的共生利益，因此選擇支持唐朝。

840年，黠戛斯擊破回鶻汗國。回鶻餘眾分為四支，其中約有十五部由烏介可汗率領投唐，其餘則由宰相駙職與龐特勤等人分別投向葛邏祿（天山東部）、吐蕃（河西走廊）、安西（天山西部），最後分別形成西回鶻國（天山回鶻國）與甘州回鶻國兩個政權。這段發展無疑都需要與隋唐王朝，以及整個歐亞內陸東部的歷史相互參照，才能更加了解多元族群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不斷地互動與較量時所帶來複雜而深刻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中時段時空背景下，突厥系族群廣泛分布在中央歐亞，《隋書·鐵勒傳》所記載諸部落，正是此一現象的具體呈現。例如在黑海北岸的伏噶昏，就是現在的保加利亞，而曷戛（Khazar）則是目前唯一得知曾改宗猶太教的遊牧族群。沙陀也是在此中時段背景脈絡下生活的多元族群之一。

沙陀是西突厥分支，故又稱沙陀突厥。根據《新唐書·沙陀傳》記載：「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²⁷安史之亂後，吐蕃進佔隴右（河西走廊），唐廷勢力撤離。789年，吐蕃攻陷北庭（治今新疆吉木薩爾），居於北庭周邊而以朱邪盡忠為首的沙陀七千帳歸降。809年，沙陀首領朱邪盡忠及子朱邪執宜（?-

²⁵ [日]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0）。

²⁶ [日] 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2018），頁350-352、373-383、386-390。

²⁷ [宋] 歐陽修、[宋] 宋祁撰，董家遵等點校，《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18，〈沙陀傳〉，頁6153。

835) 率部眾三萬餘人東走投唐，吐蕃窮追，盡忠戰死，士眾死者大半。執宜帥其餘眾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治今寧夏吳忠）降。靈鹽節度使范希朝（?-814）聞之，自帥眾迎於塞上，置之鹽州（治今陝西定邊）一帶，其後又隨調任河東節度使的范希朝，轉至河東代北。

基於上述陳寅恪先生有關隋、唐時代各族盛衰之連環性的論斷，人們是否可以考慮將傅禮初先生所謂「多重歷史相互連鎖」的時代提前，亦即從十三世紀提早到十世紀的晚唐時期？晚唐動亂始於懿宗咸通時桂林戍卒的叛亂（868-869），戰亂至僖宗朝（873-888）遍及全國各地。沙陀李克用（856-908）勢力盤據河東，在中原與朱溫（852-912；907-912在位）形成爭雄的局面。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後梁。同年，契丹耶律阿保機（872-926；907-926在位）也即可汗位。916年，成為契丹的天皇帝。阿保機的做法就如同唐太宗，既是唐朝皇帝，又是那些內屬羈縻州府的遊牧部落之天可汗。

李克用、李存勖（885-926；923-926在位）父子據河東與朱溫建立的後梁對抗，經過十七年的戰爭，李存勖於923年稱帝滅梁，建立後唐。936年，石敬瑭（892-942；936-942在位）建立後晉。947年，劉知遠（895-948；947-948在位）建立後漢。951年，郭威（904-954；951-954在位）建立後周。從朱溫建立後梁到趙匡胤受後周禪，凡53年，是為五代十國。後唐不承認後梁為正統，而以恢復大唐正統自居。於是在五行德運的選取上，選擇恢復唐朝的「土德」，藉以在軍事強制力（military coercive power）、經濟優撫力（remunerative power）之外，再取得王朝作為正統的優勢（normative power）。根據方震華先生的研究，後唐李存勖係以李唐王室繼承人自居，宣稱唐室中興。²⁸不論採取何種方式，這些戎馬出身的領導人都必須與文士合作，重視禮樂儀式，重建官僚體系。於是，他們原本都以軍事為中心的政權發生變化，也間接造成這些武人統治者某種程度上的文儒化。但李存勖在滅梁後暫停軍事擴張，致力模仿唐代皇帝形象，希望以重建唐室為宣傳，藉以威服南方的獨立王國，卻也成為其政權快速衰亡的原因。

森安孝夫認為，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至於北漢、北宋

²⁸ Cheng-hua Fang, "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 《臺大歷史學報》, 35 (臺北, 2005), 頁55-84。

等王朝，建國的主要領導階層皆出於沙陀部，因此將這些國家都歸類於沙陀系王朝。²⁹在基本史籍中，晚唐沙陀突厥名稱除單稱沙陀之外，根據西村陽子在《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中指出，還有「沙陀三部落」（指沙陀、索葛、安慶）或「沙陀五部」（指退渾、契苾、沙陀、索葛、安慶五部落）等稱謂。³⁰這都反映歷史上族群的多重連鎖。更有甚者，宋初燭影斧聲的繼位之謎，或許也能從族群互動的角度重新思索，而非只是單純的政治謀殺。這已有學者開始關注，但仍有再作討論的餘地。（紀錄 洪浩倫）

²⁹ [日] 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頁341-344。

³⁰ [日] 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令狐德棻等撰，唐長孺點校，《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 〔宋〕歐陽修、〔宋〕宋祁撰，董家遵等點校，《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二、近人專書

- 〔韓〕朴漢濟著，郭利安譯，《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新北：八旗文化，2020。
- 岑仲勉，《唐人行第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
- 〔日〕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2018。
-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唐家龍、曾培耿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 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 〔日〕西村陽子，《唐代沙陀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8。
- 〔日〕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0。
- Bermann, Jan, Michael 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Bourdieu, Pierre,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Khazanov, Anatoly M, trans.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ervice, Elman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三、近人論文

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收入氏著，《周一良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20-239。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57-133。

張廣達，〈從隋唐到宋元時期的胡漢互動兼及名分問題〉，收入許倬雲、張廣達主編，《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5，頁139-196。

陶晉生，〈同化的再思考〉，收入氏著，《宋遼金史論叢》，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515-532。

陶晉生，〈略論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宋遼金史論叢》，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533-540。

〔美〕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 Jr.）著，董建中譯，〈整合史：早期現代（1500-1800 年間）的平行發展與相互聯繫〉，收入伊沛霞、姚平、單國鉞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321-354。

楊聯陞，〈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收入氏著，《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1-19。

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氏著，《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21-42。

楊聯陞，〈官修史學的結構——唐朝至明朝間正史撰修的原則與方法〉，收入氏著，《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351-375。

劉盼遂，〈李唐為蕃姓攷（三）〉，收入聶石樵輯校，《劉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658-664。

〔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法國的經濟史漢學家白樂日〉，收入戴仁編，耿昇譯，《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299-306。

〔日〕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總說—〉，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4卷《古代4・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I》，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3-19。

Fang, Cheng-hua, “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 《臺大歷史學報》，35，臺北，2005，頁 55-84。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nd the Major Ethnic Groups of Inner Asia during 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Guang-Da Zhang,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Chang-Ting Tsai and Cheng-hung Hsu, Reviser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vised and expanded paper on the basis of an inaugural academic speech for the “First Forum of the Historical Lectures, dedicated to Academician Tao Jin-sheng” at Soochow University. The history of the Sui (518-619) and Tang (618-907) dynasties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is usually emphasized as a powerful and unified era with vast territory in contemporary records and later works. The Tang Dynasty before the An-Shih Rebellion (755-763) was indeed prosperous. The ruler of China at that time was an emperor of farming areas and was revered by nomadic people as the Tengri Qaghan. Later,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political turmoil and the divisions arising with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especially in the “fanzhen” (藩鎮;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s), were influenced by non-Han peoples, resulting in multiple overlaps in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and culture. In particular, it is worthy to note that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and interactions not only promote mutual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ach other, but also constitute an incentive or opportunity for dynastic change and for tribes to establish new states.

* Tao Jing-Shen Chair Professor.

** Guest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Therefore,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and nomadic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Shih Rebellion;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